

肆

在剪脚指甲时，你有没有发现小脚趾的指甲多了一块，稍不注意就会被剪得生疼生疼？

相信不少长沙人都有这样的惊奇发现和体会，但鲜为人知的是，这一特征表明了：你极有可能和江西人是亲戚，江西有你“老表”。老辈长沙人中流传着这样的说法：湖南、湖北人多是江西移民的后裔，其显著特征就是其小脚趾的指甲多了一块。

其实，这种现象在医学上叫跖趾，又被称作瓣状甲。瓣甲并不是江西人独有，只要你的祖上一个人是瓣甲，你就有可能被遗传了，当然，也可能没被遗传。长沙老辈人爱这么讲，不见得有十足的道理，但这许是当年因迁徙带来的一种“家族”的文化，早已深入人心。

江西人迁入湖南后，不少文化依然保留着，比如方言、饮食等。明末，辣椒传入中国，很快，辣椒就受到江西、湖南两地人的欢迎，以嗜吃辣椒著称。人们常常戏谑地说，江西人是“辣不怕”，而湖南人是“不怕辣”。湖南因为盛行吃辣椒，还把原本温雅的“湘妹子”吃成了火辣辣的“辣妹子”。

一个“辣不怕”，一个“不怕辣”，如此相似。那么，究竟是江西移民把辣椒带到了湖南，还是他们把辣椒传回了江西？时间早已把当年那些“上长沙”的江西人与湖南人融为一体，就像“辣不怕”和“不怕辣”，又怎么能分得清彼此、伯仲？

若问江西人“上长沙”的影响，首先非湖南人口的增长莫属。万历年间（1573—1620年），湖南人口约为1000万，是洪武二十四年人口数量的5.1倍多。

人多好种田。在人口即是生产力的农耕时代，有了人口就可拥有一切。随着人口数量的强势逆转和人口结构的变化，湖南农业生产恢复甚快并得以持续壮大，“楚中谷米之利散给天下几遍”。明朝中期，两湖地区已成为全国重要的粮食产地，长沙实际上已成为大米市了。宣德年间（1426—1435年），苏州、宿州一带发生灾荒，江浙等地商人的船只便“数百艘一时俱集”，米商坐庄长沙，求购大米。

明代李釜源《地图总要》云：“楚故泽国，耕稼甚饶。一岁再获柴桑，吴越多仰给焉。谚曰‘湖广熟，天下足。’”明代长沙粮食外运数量相当巨大，宣德四年（1429年），“复支运法，乃令江西、湖广、浙江民运粮二百二十万石于淮安仓”。明朝后期，长江下游的粮食需求主要依靠湖广等地供应，如安徽的徽州（黄山）粮食“大半取于江西、湖广稻以足食用也”。

嘉庆十三年（1808年），湖南人口猛增到1865万。跟着湖南人口红利的到来，包括长沙在内的整个湖北地区已成“天下粮仓”。嘉庆《长沙府志》记载，乾隆三十年（1765年）长沙府储谷量达62359石，定额为12000石，溢额率达419.7%，趋于鼎盛，有了“湖南熟，天下足”一说。

长期在低谷徘徊的人，会多么渴望巅峰。一个地方的崛起，道理皆然。湖南深处内陆，在明清以前，似没有发生过举世瞩目的重大事件，亦缺乏引领潮流、风气的领头人物。虽然曾出现过周敦颐、王夫之，但总体说来，本地杰出人才少之又少，廖若晨星。

湖南农业等经济的快速改善，使其缩小了与先进发达地区的差距。虽然历史指向过去，但它赋予当代人面向未来的智慧。此刻，湖南学子已扬起头来，星空就在头顶，若即若离……冥冥之中，命运似乎在向湖南学子招手。

“惟楚有材，于斯为盛。”岳麓书院大门上的这副对联，很好地描述了湖南近代人才辈出的盛况，以至“湘人不倒，华夏不倾”。谭其骧说：“清季以来，湖南人才辈出，功业之盛，举世无出其右。”出现这种人才井喷景象，不能不说与“上长沙”关联密切、深厚。

大凡主动迁往他乡的移民，都有一股敢闯的勇头、胆气，即使一头撞到南墙上，也不会回头。爬过了一座座山，蹚过了一道道水，风餐露宿、栉风沐雨，体魄自然益加强健。而且，拥有一颗闯荡陌生世界的心，就不会去抱怨和畏惧周遭的黑，襟怀愈加清慧、坚毅。大量江西移民的涌入，使湖南人的族缘和血缘得到了更动，人口素质犹如水涨船高，提升显著。

“人之迁徙，即是文明所向。”文化的繁荣客观上促进了民族的交融、融合，外来移民与湖南土著居民中的苗、瑶、侗及土家族长期混杂相处，既有彼此争斗，亦有相互联姻。“问渠那得清如许？为有源头活水来。”移民而来的汉人与苗族等少数民族通婚，“成了一个混血的民族，所以才有特殊的个性。”谭其骧说：“窃以为蛮族血统活力之加入，实有以致之。”

“上长沙”本身就是一个文明由东向西渐进转移的过程，对湖南的影响可谓极其久远、轩轾。不仅湖南人口素质实现了改造、提质，而且注入了移民特有的开拓意识和冒险精神，并渐渐形成明显区别于其他省份的民风：朴实勤奋、劲勇强悍、刚气好胜、霸蛮任性。湖南学子长期浸淫其间，莫不质朴淳实、不尚浮靡、勇于任事、锐意进取，士气文风激越、凸显……

湖南学子扬眉吐气、冲向巅峰，难道说，这与湖南人爱吃辣椒不无关系？



插画何朝霞



武

文脉长沙

甚至新垦荒地“永不起科”。用今天的话说，这就是国家扶持湖广大开发，要地给地，要政策给政策，谁不跃跃欲试？

从被迫到自愿，虽然时间久遥，效果却是完全不一样。

鸟儿迁徙，总是成群结队，欢呼雀跃。同理，人的自愿迁徙莫不呼朋引类，嘯信命侬。幕阜山、九岭山等山脉的西边就像一块巨大的磁铁，吸引着聚集蜂萃的江西移民。

夏日的午后，一支结伴从饶州（上饶）弋阳而来的移民队伍穿过“西口”，行进到了长沙境内的霜华山下。天气炎热，连日赶路，双脚似灌了铅难以移动。就在这时，眼前忽地冒出一片浓阴，个个打起精神，飞似的跑向一棵挺拔的大枫树。

祥云缭绕的霜华山凝结着九岭山脉的雄秀险幽之灵气，是佳景荟萃、变幻莫测的奇妙胜地，还是一片不见纤尘、自然纯净的人间乐土。移民队伍在大枫树下歇息，微风习习，鸟语蝉鸣。领队的小伙子不觉禅意飘逸，心绪飘逸，仿佛整个人挣脱了时空的束缚，除却了浮尘的掩饰，浸润在不染尘俗的幻境，尽享那飘忽在山间的清幽、融畅……

不远处的溪田间，一群青年男女正在潜心劳作。见此，领队的小伙子清了清嗓子，高亢清越地飘起了家乡的弋阳腔：“时人作事巧非常，歌儿改调弋阳腔。唱来唱去十分好，唱得昏迷姐爱郎……好难当，怎能忘？勾引风情挂肚肠。”

待听明白唱词，田间劳作的女子莫不掩面偷笑，男子则直眉怒目，故意朝着领队的小伙子呼叫抡拳，佯装打人，直把枫树下疲惫不堪的人们逗得哈哈大笑……歇了一会儿，领队的小伙子招呼大家再次上路，这当儿，移民队伍的脚步轻盈欢快，宛若一首悠扬的歌。

叁

房。百丈开外的上游，有一户早前从江西吉安移来的邻居。

闲来无事，小伙子总爱神清气爽地巡弋精心开创的这片河湾。夕阳下，金色的河水波光潋滟，他双手交叉抱在胸前，镇定自若地站立在堤岸上，深邃的目光环视着眼前这片洋溢着无限生机的土地。获花曼舞中，一对对欢乐的鸟儿互相鸣叫着，嬉笑着，这不得不使小伙子浮想联翩。这次，小伙子没有飘弋河腔，而是吟起了诗句：“关关雎鸟，在河之洲，窈窕淑女，君子好逑……”而且，他的眼睛盯着河边浅滩上就再也挪不开了，那儿，邻家姑娘正在湛蓝的河水里旁若无人地浣纱，一俯一仰、一摇一摆的动作可折煞人了，白皙的身段在粼粼波光中甚是耀眼……

这年冬天，小伙子迎娶了邻家姑娘。又一年，一个男婴呱呱坠地，弄璋之喜的小伙子忽然觉得，如他这样的移民就像一粒种子，无论是在大邑通途、江淮河湾，还是在寒山瘦水、僻壤圩寨，都能生根发芽，开花结实。

添丁进口，小伙子感受到了肩上的压力，但这难不倒脑子灵活的他，大不了农闲重操在家乡时干过的老本行，做个“货郎哥”。

明清时期，江西人不像湖南人这样具有突出的军事思想，相反，他们对计算的兴趣和追求利益的念头十分发达，在小商业方面拥有很高的天分和偏爱。其时，江西“货郎哥”如过江之鲫，几乎垄断了长江中、下游地区的大部分小商业。

“江西货郎哥，挑担到你家，你家小姑娘，爱针又爱线……”开始时，小伙子只是挑担走村串户，卖一些针头线脑、糖果零

江西往湖南移民，怎么移？

移民本是缓慢而又漫长的过程，断不可一蹴而就。可期望立竿见影的朱元璋耐不得这个烦，不但操办得有些草率、粗莽，甚至还有点儿“不讲武德”。

一道圣谕，朱元璋强令官兵持械破门入室抽丁抓人，水陆并举遣送湖广垦荒。刚刚经历连番战乱，社会趋于稳定，哪个愿意在这个时候背井离乡？可想而知，各种抵制花样百出，层出不穷，移民和官兵玩起了老鼠猫的游戏，稍不留神，就有人半途偷偷溜回了老家。官兵只好用绳子将移民反绑双手连在一起，串成一根绳子上的蚂蚱了，看谁还能开溜？除非内急若行方便，方能呼唤押送官兵解开手上绳索，由是，“解手”便成了两湖和江西一带上厕所的代名词，一直承袭，至今依然。

元朝诗人黄镇成有诗云：“岁恶无邻堪乞食，时艰何地可移民？秋来一夜江南雨，不责空困活饿人。”其实，江西人也不是不愿移民，只是不想被强制移民。强扭的瓜不甜，老百姓都明白的理儿，朱元璋不可能不明白。

见强制驱逐移民效果欠佳，朱元璋便改为政策倾斜吸引，最简单的办法就是直接给移民降低赋税。江西经济发达，民众抗拒移民对吧？不打算，只需加重赋税，就会逼得自动移民。其时，在全国13个布政司中，江西赋税始终是最重的地方之一。重到什么程度？江西洪州府每亩赋税3斗，而湖北黄州府却为6.2升，多出近5倍。

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朱元璋诏令“许民垦辟为己业，免徭役三年”。洪武二十八年（1395年），又诏令凡“洪武二十七年以后新垦田地，不论多寡，俱不起科”。到了明宣宗朱瞻基手里，更是规定“垦荒田永不起科”。一边地少税重，一边地多税轻，

出门即是江湖，挑战与机遇并存。移民不是终点，而是新的起点。

经过比较，爱飘弋阳腔的小伙子选择了在浏阳河一处荒僻的河湾安营扎寨。苍翠欲滴的群山簇拥着河水一路逶迤奔腾而来，在河湾处拐了道急弯，留下一片宽旷的河滩，然后，像一条无拘无束的银龙，自由自在地冲下游晃荡而去。清清的河水照得见小伙子俊朗的身影，河中水草茂密，如铺张着深黛的绿色，不时有鱼儿“拨刺”一声跳出水面。河滩上散发着泥土的芬芳，大朵大朵的花儿灿烂地绽放，成片的芦苇在风中曼妙摇曳……河湾是河流最美丽的地方，但小伙子似乎对这些都不打起精神，他感兴趣的是脚下这片沃腴之地。

干练的小伙子找来几根树枝，系上茅草、荷叶制成标志，插在了河湾的四周。标识高挑、醒目，河风拂拂，标箭悠悠。“这片河湾归吾了！”想到此，喜不自禁的他飘起了弋阳腔《琵琶记》：“最喜今朝春酒熟，满目花开如绣……”

《中国戏曲志》说：“明代弋阳腔流入湖南，结合长沙当地语音，形成了湘剧。”不知道风行明朝“长沙府十二属”的湘剧是不是就是从这位小伙子肇始？但湘剧《琵琶记》从明朝唱到如今，长沙人的爱重之情依是不减。

插标占地，这是人类第一次开垦这片河湾，浏阳河敞开心扉接纳了爱飘弋阳腔的小伙子入驻。这天，碧绿的河水“哗哗”地唱着歌，不断翻腾着喜悦的波澜。这儿的的确是适合人住居、耕作，翌年，小伙子种在河滩上的粮食喜获丰收，成石成石的粮食换成砖瓦，他在堤畔盖起了一栋砖瓦

业之盛，举世无出其右”。

融汇，民风迥殊，土气文风激越、凸显，“湖南人才辈出，功的逆转，改变，湖南经济得以持续发展，造成文化的更迭、展现了这一过程。”

“上长沙”令湖南迎来了人口红利期，人口数量和结构同文明的碰撞、交融。去年热播的地方史话剧《天宠湖南》填湖广。人口迁徙既是不同生产方式的传播交流，也是不同元末明初，一次规模空前的人口迁徙爆发了，即江西

走「西口」，上长沙

范亚湘

壹

节前回乡，节后返程。每年春节期间，都涌现临时性人口大迁移，就像候鸟一样，往返于故乡与工作、生活之地。当然，这个迁移只是节日性的人口流动，而非移民。殊不知，早在600多年前的元末明初，爆发了一次声势浩大的人口迁徙，借用一句民谚，便是“江西填湖广”。

湖广是元朝一级行政区湖广等处行中书省的简称，辖今湖南、湖北、广西、海南、贵州大部、四川一部以及广东雷州半岛等地，其时亦被称为鄂州行省、潭州（长沙）行省、湖广行省，到了明清，湖广专辖湖北、湖南，今之，仍旧特指两湖。

《说文》曰：“填，塞也。”一个“填”字，揭开了湖广移民史上波澜壮阔的一页，东飘西徙，流离播迁，莫不饱含着时代的风霜、沧桑。试想，该是一支支多么庞大的移民队伍？给湖广充塞了多少沉雄悲壮、凄苦缠绵的故事？还因为这个“填”字，“填”出了湖南、江西两省之间的友情、亲情，不少湖南人至今仍认为与江西人存在亲戚关系，称江西人为“老表”，抱团前往江西寻根、拜祖。

江西与湖南虽然毗邻，但两地之间横隔着呈北北东向雁行错列的幕阜山、九岭山、武功山、万洋山等重岩叠嶂，壁立千仞之间的长廊断陷、溪谷盆地构成了天然交通孔道，亦是江西人西迁必走的“西口”。

夕阳西沉，金色的余晖映照在峻峭的山峦，似披了层神秘的面纱。一支支逶迤数里的移民队伍扶老携幼、拖家带口，牵着牛，赶着羊，朝西行进。他们有的用箩筐一头挑着婴儿，一头挑着衣被细软；有的用土车推着老人和小孩；有的肩上扛着一个孩子，手里牵着一个孩子……他们大都脸色茫然，脚步沉重。昨日，还在与族亲和恋人的告别宴席上杯酒解怨，恋恋不舍，今天，就在含泪的送别中毅然起行，尽管前路渺茫、莫测，仍得义无反顾，走“西口”，“上长沙”。

前方的道路看不到尽头，即便沿途风光无限美好，也难掩人们内心的落寞、怅然。霞光迷蒙了一少女的双眼，她放缓脚步，悄悄地掏出一块玉佩仔细端详，这是相恋之人送给她的信物，仿佛还带着他的体温……她已经掉了，身影孤单、萧瑟。是的，此去虽如鸟儿迁徙，但这次却没有归期，不知何日才能与心上人重逢？她有些仓惶、迟疑，忽而，一滴晶莹的泪珠坠落在无瑕的碧玉上，夕阳温润了玉佩，也温柔了泪水。少女回望了一会故乡，咬了咬牙，扭头追赶回去的队伍。

西进的移民队伍像溪水一样流动，那么，究竟是什么原因导致江西人“上长沙”？

翻开历史就会发现，“老表”的祖上可说是相当值得骄傲！从南宋到清朝中期，被誉为“吴头楚尾，粤户闽庭”的江西非常富庶、繁荣，不管是农业、手工业还是商业，均居全国前三。江西教育更是异军突起，独领风骚，“两宋文人半江西”，唐宋八大家里，就有欧阳修、王安石、曾巩三位江西人。仅仅明朝一朝，江西有进士2724人，占全国的11.9%；89个状元中，江西有17个；53位首辅中，江西有9位，以至“朝士半江西”。直到道光二十三年（1843年），上海开埠，商路与贸易重心转移，江西的地位才逐渐衰落。

“老表”的祖上厉害，可也有一个社会矛盾十分迫切、尖锐，便是地狭人稠，百姓生存艰难。《中国人口史》记载，隋唐时期，洪州（南昌）人口户数远超长沙，天宝十一年（752年），长沙人口户数为21800户，而南昌则是55459户。元和年间（806—820年）洪州有9万多户，人口近50万，占全国人口的1.3%。进入宋元，江西人口排名全国第一。日中则昃，地满必溢，难怪，谭其骧《湖南人由来考》说，早在隋唐宋元时期，就有江西人外溢迁入湖南“以图生计”。

海瑞《兴国县八议》说：“吉安、南昌等府之民，摩肩接踵。”明朝江西人口密度有多大？梁方仲《中国历代户口、田地、田赋统计》记载：“洪武二十六年（1393年），江西的人口密度居全国第二；弘治四年（1491年）居全国第三；万历六年（1578年）居全国第四。”

明朝江西不但人口密度大，且还有个显著特征，就是由北向南依据地势的抬升依次递减。其时，江西人口主要集中在鄱阳湖平原和赣江中下游盆地，即今上饶、南昌、吉安、九江四地，这正好对应了“填湖广”的移民主要出自今南昌、丰城、九江、德安、景德镇、乐平、鄱阳、弋阳、余干、吉安、泰和等市县。

而湖南就大不相同了！

至正二十四年（1364年），朱元璋派大将徐达经略长沙。徐达与陈友谅旧部和元朝残余势力苦苦缠斗、鏖战，直至洪武元年（1368年），明朝才确立在长沙乃至湖南的统治。洪武五年（1372年），朱元璋将潭州府改名为长沙府，辖长沙、善化、湘阴、浏阳、宁乡、益阳、安化、湘潭、湘乡、醴陵、茶陵、攸州（攸县）等“十二属”，差不多占了湖南半壁江山。

元末明初的连年战祸，使湖南地旷人稀，野荒民散，许多地方十室九空，渺无人烟。至元二十七年（1290年），湖南人口570万，而到了洪武二十四年（1391年），湖南人口不增反降，只有193万。这是什么状况？若按照现在湖南土地面积21.18万平方公里计算，每平方公里不到11人。

同时，湖南荒地多还与水土流失、变化有关。范仲淹《岳阳楼记》说洞庭湖“浩浩汤汤，横无际涯”，是在宋朝，当时，洞庭湖还是我国第一大淡水湖。到了明朝，洞庭湖水面不断萎缩，拱手将江湖“老大”让给了鄱阳湖。泥沙淤积，填湖造陆，这一时期，洞庭湖平原成片的肥沃荒地，衰草连天，几无耕作。

一方人多地少，一方人少地多，江西往湖南移民，自然成了一举两得的美事，如是，既能充实湖南人口，发展湖南经济，又能缓解江西社会矛盾。靠着一个破碗行乞起家的朱元璋当然深谙这个道理，如此好事何乐而不为呢？

明朝尚书郑晓《吾学编·皇明地理述》云：“江西之民，质俭勤苦，时有忧思。”安土重迁，古今同之。谁想挥别故土，外移他乡？唯有当故乡再也不能承载其生存时，才会因为生计铤而走险。然而，适者生存，就如候鸟的迁徙，其目的只有一个，为了寻找理想的生存之地。明朝大量江西人之所以“上长沙”，说白了，几乎都是迫于生计的无奈抉择。